

唐宋八大家传 ④

曾
巩
传

宋友贤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唐宋八大家传（4）

曾 巩 传

宋友贤 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曾巩传/宋友贤著. —广州: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00.12
(唐宋八大家传; 4)

ISBN 7-5361-2540-2

I. 曾… II. 宋… III. 曾巩-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1999 号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广州大道北广州体院内 20 栋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1 插页 220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~2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

曾巩像

《唐宋八大家传》总序

唐宋八大家者，唐宋文坛之八颗巨星也。稍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晓得他们就是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及曾巩。“八大家”之称，虽然晚至明代才提出，但他们在活着的当时，已拥有浩浩荡荡的追随者，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无法准确估量，关于八大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真可谓卷帙如山了。

如今继续啃死人骨头还有味道么？至少我们认为，答案是不宜简单否定的。在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浩劫中，我们曾目睹过不少伤筋折骨者，据给予治愈的杏林高手透露，那主治的丹方中就用了枯骨所研成的细末。啃死人骨头的目的，理应是为了活人。世易时移，活人的病变花样是层出不穷的，枯骨何以更有效地治疗今疾？这就存在着继续研磨的需要。

文章最忌随人后，著述从来贵创新。赶时髦并不意味着创新。不知始于何时，“运动”一词时髦起来。在那不断地运动群众的年代，“运动”更是时髦得很，以致我们的一些学者也趋附了，把八大家及其追随者在不同时代的分散努力也冠之以“唐宋古文运动”的名堂，髦得可爱。然而名实是否相符？本丛书有的著者就提出了新的见解。

往昔的论者，多用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以明道”来概括八大家的文学主张，认定他们的宗旨是“复古”、“兴儒”。事实果真如

此吗？当然，八大家说过不少“志乎古道”、“文必与道俱”之类的话，但这“道”的实质，仅是古儒之道，乃至腐儒之道吗？不。“复古”、“兴儒”恐怕只是他们打出的旗帜，真正的目的乃是要摧毁那华而不实、束缚自由的骈俪文风，推动文学朝“言必近真”、“文从字顺”的方向革新。不然的话，他们的另一些更具影响力的至理名言将作何解释？“词必己出”，“古人亦人耳”，只宜“师其意，不师其辞”，“惟陈言之务去”云云。显然，他们是坚决反对拘泥古训、食古不化的。

“四人帮”曾经鼓吹过臭名昭著的“帮八股”，其流毒虽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所荡涤，然而有些人，也许余悸在心，也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迄今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并未蔚成风气，动辄有“打棍子”、“扣帽子”之类的帽子飞来；要么全盘肯定、要么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惯势，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评价。本丛书试图克服这种种偏向，尊重历史事实，扬善而不溢美，抑恶而不失真，还八大家的本来面目。所谓“八大家”，是个文学概念，因此，本丛书着重勾勒传主的文学家形象，即使是被列宁誉为“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”的王安石也是如此。在此基础上，开拓新思路，从新时代的视角去观照八大家所走过的道路，挖掘他们最可宝贵的改革创新精神，探究他们成功的奥秘，为酿就新时代的新文风贡献力量。这就是组编本丛书的终极目的。

“不泥古”、“不落套”既然是八大家的作风，本丛书也就不打算从体例、格调、篇幅等方面去强求死板的一致，以免形成新的俗套，束缚诸位著者学术专长的自由发挥。八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家，为行文方便、避免重复起见，只好委屈“三苏”合为一卷，并非缘于粗制滥造或因陋就简。这是要向读者诸君特意说明的。另外，八大家中有三家出自江西，因此我们特约请江西籍

或长期在江西工作的学者、专家撰稿。他们出于对古代乡贤的仰慕，长年潜心研究，广泛搜集资料，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的优势，相信他们是不会令读者失望的。

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坛巨星，愿这小丛书伴随着众多的新星焕发光彩。

杨明新 何业光

1996年中秋于广州天河

前 言

在灿若繁星的我国古代作家队伍中，“唐宋八大家”光芒四射，炳耀天际。而其中的曾巩，以其卓越的创作成就，颀颀其间，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。

曾巩（1019—1083），字子固，宋建昌军南丰县（今江西南丰）人。他生活在11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北宋中期，历经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四个朝代。那时，中国封建社会由峰巅开始下滑，各种衰败的现象渐次显露：外患日深，疆土日蹙，官乱民贫，俗薄财穷。而朝廷上下，犹自因循苟且，泄沓成风，不思振作，应变无方，使宋王朝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。面对着这种时代的总趋势，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，无不矍然奋起，大声疾呼，纷纷向朝廷进献强国之方、救危之策，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。于是导致了后来的“庆历新政”和“熙宁变法”。

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曾巩，其思想、志向、为学、从政，乃至至于诗文创作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

曾巩从青年时代起便胸怀“欲挽白日之西颓”的匡世大志，意欲辅佐帝王，“经画天下”；革新诗文，挽救文运。他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知识底蕴深厚；他躬耕陇亩，多识民情；他久困下僚，深知弊政。以其所得写成了策论、杂议、奏疏百数十篇，

涉及吏治、刑法、边防、教育、赋税、财政、水利等方面问题，反映了他广阔的政治视野。所议重在实用，每多卓见。他的经济论文大受推崇，神宗说他“以节用为理财之要，世之言理财者，未有及此”。对于他的《救灾议》，后人称赞：深思熟虑，为百姓长远打算，是真正经济有用之文。他的许多政治性论文，如《说官》、《请州县特举士札子》，都是具有革新精神的；而《唐论》一篇，后人认为“高瞻远瞩，气象不凡”，“此等议论自曾、王以前无人道来”。后来他步入仕途，在齐州、襄州等七个州、郡担任太守，所到之处，首先解决当地人民所忧所急的迫切问题，诸如打击豪强、抑制兼并、革除弊政、平反冤狱、兴修水利、减赋赈灾等等，深得民心。当他任满离开齐州的时候，州民把守桥梁，闭上城门，不愿他走，于是连京城也盛传他的政声，充分显示了他突出的政治才能。同时代的人说他身负王佐之才，应该是可信的。然而曾巩并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。

他很不幸，一生中大受谤伤。一直生活在别人的“深嫉积毁”之中。这种谤伤，从他未仕之时便开始了。王安石为他辩诬，并分析原因：天下愚者多而贤者少，愚者本就忌恨贤者，而贤者又自守不移，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愚者自然更加怨恨，于是发为毁谤。这是很有道理的。曾巩是一个醇儒，他忠实于儒家理想，勇于适道，自守不回。坚持以道德自律，以风节自励。为人正直，遵行礼义，不肯阿世媚俗。当他 39 岁步入政坛时，党争渐趋激烈，他挺立无所附，更不屑于投机钻营。他不是把自己比作高松，就是比作鸿雁，而耻作“俯啄腥污”的白鹭。于是更不为忌嫉他的人所容，对他的谤伤也变本加厉。其中吕公著表现得最为恶劣。此人反对王安石变法，跟司马光最为亲厚，后来在元祐中，两人同为宰相，尽废新法。就是这个吕公著在神宗面前污蔑曾巩：“行义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”。话虽不多，却足以

置曾巩于死命，因为品行道义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，吕公著恰恰就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否定了曾巩，使得曾巩转徙七州，漂泊天涯，壮年补外，白发还朝，不久便死，终于未能施展他的治国才能。

曾巩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和特点的人。

他诚然尊儒崇道，具有很强的道统观念，却并非令人不敢亲近的假道学。他具有至性至情。事亲至孝，父死后，“奉继母益至。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，宦学婚嫁，一出其力”。对亡妻晁文柔一往情深，至老不改，悼亡之作，读之令人酸鼻。他以诚信对待朋友，“朋友有不善，必尽言其过，有善必推扬其所长。奖诱后进，汲汲惟恐不逮”，充满人格魅力和人情味。

他也不是一个只知道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会说不会做的迂儒，而是一个多识民情，深谙治道，能言善行的治世能臣。他担任太守的七个州，都是很难治理的所谓“剧郡”，但他每到一州都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，便变乱为治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现实生活中的曾巩，智计百出，而且极有魄力。他之所以自称为“拙者”、“迂阔”，既系自嘲，也表明了他“自守不回”的态度。

《风俗通》这本书认为儒有通儒俗儒的区别。稽先王之制，立当时之事，那是通儒。曾巩当属此类。他虽常常引称“先王之道”，但又认为后世可以有所损益。他在《洪范传》中就提出了“有常有变”的命题，而在《礼阁新仪目录序》中更说得明白：“古今之变不同，而俗之便习亦异，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，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。”而当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实行变法时，他多次上疏赞扬神宗“更制变俗，比迹唐虞之志”。说明他在理论上、思想上是赞成变法的。而在实践上，他也是新法的积极推行者。他跟王安石的分歧，主要在变法的步骤方法上，并非根本对立。他从来没有否定新法，更没有攻讦王安石。在他们的晚年仍

有诗歌酬答。王安石云：“高论几为衰俗废，壮怀难值故人倾。”曾巩云：“素交千里远，谁听此时歌？”他们仍然是朋友，某些史书说他们的友谊“始合终睽”、“凶终隙末”是不真实的。

很早以前，王安石就有诗赠曾巩：“借令不幸贱且死，后日犹为班与扬。”曾巩在政治上未能得志，却也没有“贱且死”，倒真的成为像西汉班固和扬雄那样的杰出人物。

《宋史》本传说他：“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，纡徐而不烦，简奥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谓难矣。”

曾巩确实是“自成一家”而且“卓然”的。

在那时候，读书人懂得经义的很少，也不讲究仁义礼乐之道，只是崇尚文辞。不是寻找华丽的辞藻来装饰自己的文章，便是一心钻在章句注疏里面。按照曾巩的说法，圣人之道泯泯没没，竟有一发而系千钧那样的危险。而曾巩却“学与众违，言行少合于世”，慨然有扶衰救缺之心。他钻研儒家经典，卓然有得。足以发六艺之蕴，正百家之谬。他跟宋初那些单纯以儒学相号召的古文家不同，比较关注现实，文章因事而发，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，带有实践性的品格。

曾巩在《与王介甫第一书》中，传达了欧阳修对王安石文章的疏导意见：“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，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……孟韩文虽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。”其实，曾巩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艺术最重创造而忌依傍。要从有法到无法。唐宋八大家中的各家就各不因袭，自成一统，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。

由于曾巩主张“文道合一”、“文章兼胜”，并特别强调“蓄道德而能文章”，这就决定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基本倾向。在宋代散文平易自然，流畅婉转的主体风格的基础上，他的散文柔婉舒缓，含蓄峻洁。既不同于苏轼的纵放驰骋，汪洋恣肆，也不同于

王安石的拗折峭削，劲悍廉厉，即使与欧阳修有着师承关系，在文章的纡徐委备，往复百折等方面颇为相近，但两人仍然是同中有异。欧阳修的文章有豪健峻伟，清音幽韵的特色，而曾巩的文章却有严谨平实，尔雅深厚的个性。

总的来说，曾巩的散文是属于阴柔一路的，但柔中有刚，散中有骈，例如《祭王平甫文》就是具有阳刚之美的。举凡一个大作家，不只有他独特的个性和特色，而且其语言风格又总是多样化的。

曾巩的诗歌也是很有成就的。他的两个学生秦观和陈师道说他工于诗，实非公允之论，不为后世所认同。其实曾巩的诗写得很好，诗风平实清健，朴实简洁。其表现手法多用赋体，以铺叙白描和夹叙夹议见长。特别是后期的诗歌更臻成熟，从前期的古朴凝重转而走上了清新婉约的道路，比兴之作比前期多了，佳作纷呈。曾巩的诗歌创作确实为形成宋诗的独特风格作出了贡献。

曾巩是有其思想上、写作艺术上的局限性的。

曾巩的思想核心是讲大学之道。他不仅以此为立身之本，而且要施用于世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。尽管这种理想连孔子本人也没有实现过，而曾巩却笃信坚守，终生服膺。在那个时候，儒学属于正统，曾巩忠实于他的信仰是无可厚非的。问题在于他没有很好借鉴、吸取百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，因而限制了自己。

曾巩博览群书，儒学以外的书也看得很多，但他由博返约，都返约到大学之道、中庸之道上了。他竭力维护儒学的纯洁性，当别的作家出入佛老，旁参名法纵横的时候，他却很少吸收这些东西。他的文章傍着道理做，不谈道的很少，连园亭杂记这类散文也都谈道。如《清心亭记》本应写景抒怀，他却纵谈“虚其心

者，极乎精微，所以入神也；斋其心者，由乎中庸，所以致用也”，因而减少了这类散文的艺术情趣。

有人认为曾巩不善于描写景物，不善于抒情，也有人说骈赋非其所长，如果我们细读他的《拟岘台记》、《道山亭记》、《祭亡妻晁氏文》、《祭王平甫文》便知不是这样，只不过这类文章在他的集子里不多罢了。就他的天分、艺术功力来说，他是做得到的。他并非不能，而是不为。他在《答李沿书》中就对李沿向他请教为文而不问道提出批评，认为李沿汲汲乎辞，务其浅，忘其深。而大学之道才是一件大事，他要得诸心，充诸身，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。而讲究文辞是不得已的事情。这说明曾巩虽然主张“文道并重”，但他并没有刻意为文，生平“未尝著书，其所论述，皆因事而发”。如果他能摆脱儒家的局限，做到权衡百家，荟萃众美，多方借鉴，推陈出新，发而为文，那么他的文学成就是会更大的。

目 录

前 言	(1)
第一章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	(1)
第二章 蛰伏江南	(37)
第三章 从太平州到馆阁	(104)
第四章 转徙七州	(164)
第五章 晚年岁月	(242)
第六章 卓然大家	(271)
后 记	(281)

第一章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

从南昌东南行 400 余里，在蜿蜒起伏的武夷山脉，以及雩山脉之间的一片河谷平原上，耸立着一座美丽的县城，那就是南丰，我国北宋时代著名文学家曾巩的故乡。

南丰炳灵毓秀，号称名邑。它建县于三国吴太平二年（257），初名丰县，后来因为徐州也有丰县，遂改今名。

南丰山清水秀，风光绮丽，西峙军峰，南枕盱水。这军峰雄奇峻秀，其高万仞，在整个赣东卓立无俦。据说在西汉时代，长沙王吴芮奉命征讨南粤，兵至山下，令部将梅铨祭拜山神，礼成后，看见云雾中旌旗招展，兵马奔腾，吴芮便把这座山命名军山，又叫军峰。军峰高出云表，百里之外都可以看到，翠压五岳，壮观天地。古人形容军峰“一带翠屏青窈窕，半空螺髻碧嵯峨”，这是很确切的。

而这盱水，属于长江流域抚河水系，发源于广昌县驿前乡血木岭东，全长 150 余华里，沿途容纳众水，光是南丰境内，便汇入了 22 条支流，遂成浩荡之势，名叫盱江。盱江从波罗流入县境，漫江碧透，波光粼粼，流经金鱼潭便绕城而过，逶迤北去，直下临川。而南丰县城就在山环水绕之中，所以这里的风光是很美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，就是当地社会

和人文活动的基本载体。县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，“挹军峰之苍翠，临盱流之清漪”，听惯了山水的清音，看惯了江上的白帆。山水的灵气，陶冶了人们的性情，添助了人们的文思，造成民风淳朴，温厚和平。农夫安于耕作，妇女勤于纺织，读书人崇尚礼义，工擅诗文，使得南丰很早便有了名气。

当历史发展到北宋的时候，由于前代大运河的开通、大庾岭商道的拓展，南北交通频繁，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，给江西的发展带来了大好的契机。加上中唐以来，北方战乱频仍，人民痛苦不堪，纷纷南移，而江西较两湖和淮南更为安全，所以也就成了主要的移民区域，使得江西人口大增。例如在南朝宋大明八年（464），临川郡（辖南丰等九县）共有8 983户，64 804人，平均每县只有998户，7 200人，可是到了北宋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建昌军（辖南丰等二县）就有了112 887户，185 036人，平均每县56 443户，92 518人。户数增加57倍，人口增加了13倍。当然户口的增长，包括人口的自然繁衍，外迁人口的回流，但移民占有较大的比重。移民带来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，和当地人民结合在一起，促进了江西经济的迅速发展；移民中又有很多士大夫，对江西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在那个时候，江西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，在全国各路中堪称翘楚；手工业蓬勃发展；商业贸易非常活跃；航运与造船业空前发达。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对南丰南城一带的情况就作过这样的描述：“盱江南北，地方千里，田如锦绣，树如烟云，原隰高下，稍涉腴美，则鲜有旷土”（正德《建昌府志·秩官》）。故当时朝廷每年通过汴河，从东南输入600万石漕粮进京，其中相当部分来自江西。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中云：“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，江西居三分之一，天下漕米取于东南，东南之米多取于江西，是宋代江西漕运，盖二百万石也。”可见江西上贡朝廷的粮食居全国第一。《宋史·地

理志》也有记载：“江西茗菴、冶铸、金帛、粳稻之利，岁给县官用度，盖半天下之人焉。”

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，江西的文化教育也空前兴盛。印刷业享誉全国，文章之士与藏书家也特盛于江西。除了各州、府、军、县相继建立官学外，私人兴办的书院在全国也居于领先的地位。在全国 203 所书院中，江西就占了 80 所（陈文华、陈荣华《江西通史》374 页）。读书风气大盛。北宋晁冲之《夜行》诗写道：“老去功名意转疏，独骑瘦马取长途。孤村到晓犹灯火，知有人家夜读书。”这种现象随处可见。以子弟不学为咎，不文为辱，也成为当时社会比较普遍的心态。而南丰，无疑是占风气之先的一个县份。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（976—984），曾致尧就创办曾氏书舍（南丰书院）于南丰，成为北宋时代江西最早的书院之一。

宋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），曾巩降生在南丰曾氏家族里。

曾巩，字子固，世称南丰先生。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祖父曾致尧已经逝世 8 年了。父亲曾易占这年 41 岁，正在离家不远的临川县担任县尉。

曾巩的远祖是夏禹的后代，姒姓。禹的五世孙封其次子曲列于鄫（今山东省峰县境内），春秋之际，鄫国被其邻国莒所灭，其太子巫投奔鲁国并留在鲁国做官，去邑（“阝”）为曾。这就是后世曾氏的来源。

曾巫生子曾天，曾天生子曾阜，都声名不显，但曾阜的儿子曾点，曾点的儿子曾参，却是孔门的高弟与传人，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。

曾点，字皙，是孔子的弟子之一。《论语》中的《先进篇》记载着他与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陪侍孔子各言其志一事。曾点云：